

柔性治理的隐形书写 ——《人类之子》的反乌托邦叙事

郑凌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英语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DOI: 10.61369/SSSD.2025090040

摘要：P·D·詹姆斯的《人类之子》在反乌托邦文学谱系中以“技术失灵”的设定展现出独特的人口延续叙事。本文指出，科学的不确定性并未削弱治理机制，反而成为柔性权力的温床。小说通过典狱长政体的象征性描写，揭示出以仪式、社会冷漠和制度化安排为手段的“柔性监控”，这种治理逻辑超越了传统的高压统治，体现为日常化、潜伏性的权力运作。借助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文章分析了“静寂仪式”、公共空间的空洞化以及民众政治冷漠等情节，论证詹姆斯如何在没有显性压迫的环境中展现权力的渗透。研究表明，该小说不仅延续并改写了人口延续反乌托邦传统，也为理解当代社会“柔性治理”的文化隐喻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柔性治理；反乌托邦；女性主义

The Invisible Writing of Flexible Governance: The dystopian Narrative of "The Son of Man"

Zheng Lingnan

College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420

Abstract: P. D. James's *The Children of Men* occupies a distinctive position in the genealogy of dystopian literature through its narrative of reproductive crisis framed by "technological fail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science does not weaken governance but rather nourishes the ground for flexible forms of power. By depicting the symbolic regime of the Warden of England, James exposes an "invisible surveillance" that relies on rituals, social indifferenc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governance transcends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coercion and manifests as a quotidian, latent mode of control. Drawing on cultural studies and feminist theory, the article examines narrative elements such as the "Quietus," the hollowing out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political apathy of citizens, to show how power infiltrates everyday life without overt repress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James not only extends but also revises the tradition of reproductive dystopia, offering a cultural metaphor for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forms of "unseen governance."

Keywords: flexible governance; dystopian literature; feminist criticism

引言

自1992年出版以来，P·D·詹姆斯（P. D. James）的《人类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始终游离于反乌托邦文学的边缘地带。在传统反乌托邦文学多聚焦显性压迫的叙事语境中，阿特伍德^[2]（Margaret Atwood）在《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通过强制与全景式观看建构神权政体；玛奇·皮尔西^[3]（Marge Piercy）在《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中则借技术共享设想平等未来；而詹姆斯^[1]选择技术退场，以社会冷漠与象征秩序维系隐蔽的掌控。这种叙事差异并非简单的情节设定区别，而是对“柔性治理”本质的深度解构——科学失效非但未动摇统治根基，反而为非高压权力提供了滋生土壤，其核心机制表现为仪式化的日常规训，而非传统的高压镇压。小说设定在所谓“欧米茄年”之后，人类失去生育能力，科学与医学都无法给出解释。这一“技术失灵”不仅击碎了现代社会对科学万能的信仰，也为英国典狱长赞·利皮亚特（Xan Lyppiatt）建立貌似仁慈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契机。通过“静寂仪式”等制度化实践与福利承诺，换取民众的政治冷漠与顺从。表面上社会井然有序，实则生命与身体已被悄然纳入权力的管理逻辑之中。《人类之子》展示的是一种不依赖高压装置的柔性监控：权力的渗透并不通过高压手段，而是通过仪式化、象征化与文化的方式日常化存在。

本文正是立足于这一“隐形书写”，将《人类之子》置于反乌托邦的谱系之中加以考察。文章将结合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并援引福柯“治理术”的概念，分析小说中权力与监控的隐形机制。

一、人口延续叙事与反乌托邦谱系

在反乌托邦文学传统中，延续与再生产始终是核心议题。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作家们不断借未来的生育想象折射现实的权力机制。随着二十世纪下半叶避孕、人工授精和体外受精的普及，女性身体日益卷入医学化、制度化的规训网络。女性主义文学因此出现分化：一方面期待技术解放性别，另一方面又警惕其转化为新的控制手段。在这一语境中，P·D·詹姆斯的《人类之子》虽不如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受关注，却通过“孕体”的政治化书写，在女性主义反乌托邦谱系中占据独特位置^[4]。

不同于阿特伍德以强制怀孕与监看构建神权政体，《人类之子》的统治逻辑呈现为“隐性掌控”。典狱长政体并未直接占有朱利安的孕体，却依赖社会冷漠、空间监控与象征性权威，让她始终处于“可被争夺”的状态。这种柔性治理与柔性监控通过日常机制实现：庄严的“静寂仪式”把人口调控包装成自愿选择，“咨询委员会”的空转削弱了参与意愿，典狱长的威望则维持着表面秩序。科学的无能更为这种体制提供合法性。面对“欧米茄年”的集体不孕，医学无法解释，现代社会赖以自豪的控制未来的能力突然崩塌。科学失灵不仅动摇了认同，也为政权以“仁慈”之名获得民众默认提供了契机。

在这一背景下，朱利安成为唯一的希望。她的怀孕立刻被赋予公共意义：既是物种延续的象征，也是潜在监控的焦点。虽然没有直接的医学强制，但孕妇被视为“风险承载者”^[5]的观念随时可能启动。朱利安拒绝医院检查、选择在修道院秘密分娩，正是对医学化规训的防御。她的孕体同时凝聚了社会矛盾：既是私人经验，也是群体希望的投射。西奥既保护她的隐匿，又在叙述中不断以“未来的母亲”来界定她，折射出社会潜在的占有欲。

这种张力在女性主义理论内部早有反映。科瑞娅^[6]批判医学化生育延续了父权逻辑，法雅斯通^[7]则主张借助技术解放女性。詹姆斯通过朱利安的描写把二者的冲突形象化：她既拒绝医疗干预，又承载着人类唯一的延续希望。这种双重性凸显了孕体主体性的脆弱与不稳定。

置于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传统中，《人类之子》既与阿特伍德、皮尔西呼应，又展现出独创新。皮尔西在《时间边缘的女人》中通过体外孕育构想共享责任，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展现高压占有；詹姆斯则通过技术退场与科学失灵的设定揭示另一种危机：即使医学与科技消失，社会对孕体的监视欲望依旧存在。街道的整洁、废弃的学校与游乐场、失去功能的公共设施，共同营造出一种“无未来”的氛围。在这种场景下，反抗只能以零散、隐匿的方式存在，成为“日常化反乌托邦”的写照。

由此，《人类之子》提供了区别于高压控制和技术乌托邦的第三种可能：它揭示柔性治理如何通过冷漠、仪式与象征在无形中维系统治。詹姆斯借孕体书写提示我们，当希望被公共化时，个体经验随时可能被稀释。她不仅补充了女性主义反乌托邦的谱系，也为理解当代社会“隐形权力”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二、柔性治理与柔性监控

在《人类之子》中，詹姆斯描绘了一个表面温和却高度规训的社会。自“欧米茄年”后人类陷入全面不孕，典狱长赞·利皮亚特建立起一种披着“仁慈”外衣的统治。它不同于《一九八四》式的高压，却通过制度化的仪式、象征性权威和社会冷漠来维系统治，使个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规训。即便科学与医学失效，权力依旧能塑造出驯服的身体与顺从的心灵。

最具代表性的机制是“静寂仪式”。它是一种表面自愿、实则制度化的群体性终结仪式：人们在庄严的场景中走向生命的终点，看似体面，实则完成了对生命终结的制度化安排^[8]。当生育这一手段失效时，权力便转向终结性管理，以“善意”的姿态弥补无法掌控出生的缺口。静寂仪式由此重写生命价值，使个体在感伤与冷漠间逐渐放弃反抗。这一安排构成权力链条的第一环：象征上的重编码引发心理上的去政治化，进而使公共空间失去未来感，抵抗被压缩到最小。废弃的游乐场、荒凉的学校和海边的仪式场景，共同展示了制度—心理—空间—政治的层层递进。

柔性治理同样渗透在公共空间与社会结构中。街道整齐、设施完备，却缺乏儿童的身影；商店橱窗依旧陈列玩具，却无人问津；教堂钟声犹在，却只剩老年人静静聚集。儿童象征未来，他们的缺席让人直观感受到“反抗无意义”，民众因而主动放弃政治参与。这种自我放弃比强制镇压更有效，因为它把控制内化为习惯。典狱长无需科技监控，只凭象征性威望与信息操控即可稳固权力。议会与咨询委员会不过是空壳，所有决策集中于他一人。赞·利皮亚特以冷静与贵族气质维持表面拥戴，却依靠治安部队排除异议。这与福柯^[9]提出的“治理术”不谋而合：权力并非依赖直接的压制手段，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与知识建构渗透到身体与日常。当人口延续调控失效，治理转向“终结性管理”和“希望管控”，孕妇与其保护者便成为被间接掌控的人口类别。

在此语境中，反抗只能以零散形式出现。“五鱼”组织是残余的抵抗力量，他们没有宏大的政治纲领，只能秘密行动来保护朱利安和她的孩子。这种“微型反抗”凸显出詹姆斯对社会的设计：在缺乏未来和大叙事的背景下，抵抗也只能在裂缝中延续。朱利安的怀孕因此格外重要。她不仅是个体主体，也被赋予公共意义。她拒绝医院检查、选择在乡村修道院秘密分娩，这些细节表明她对制度化医学的不信任。她的身体成为政治战场，既可能成为国家介入的对象，又是抵抗潜伏的空间。

叙述者西奥的手记体进一步强化了监控主题。他既是见证人，又是记录者，他的文字将事件转化为档案。书写意味着归档，而归档本身就暗示可治理。西奥看似冷静的记录，实则在生产秩序化的知识框架：孕体的迹象、分娩的过程都被纳入分类与保存。私人叙事因而成为不自觉的监控工具。詹姆斯借此提醒我们：治理不仅存在于国家机器之中，也潜伏在知识与文化叙事的生产环节。

空间描写同样揭示了监控的无处不在。乡村与修道院本应是庇护所，却充满眼线，显示反抗随时可能暴露。看似空旷的地理空间在社会关系中已被监控网络化^[10]。人物塑造也延续了这种逻

辑：典狱长即使不出场，他的权力也通过法规与社会习惯无形渗透；朱利安的怀孕迫使她进入流动与漂泊，身体成为希望与争夺的双重象征。

这种双重性正是阿甘本^[10] 所谓“赤裸生命”的文学化呈现。在集体不孕的背景下，朱利安脱离普通公民身份，被社会共识定义为资源：她既可被塑造成宗教神迹，也可被国家认定为公共财富。这种“可被任意定义”恰是柔性治理下赤裸生命的特征。

因此，《人类之子》揭示了一种日常化的反乌托邦逻辑：科学退场并未削弱权力，反而催生更隐蔽的控制。朱利安的孕体不仅是延续的希望，更让潜伏的权力逻辑显形，提醒我们监控早已融入习惯与冷漠之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核心张力。

缺席”与“科学失灵”的设定揭示出隐蔽的治理逻辑。“静寂仪式”、公共空间的空洞化与典狱长的象征性统治共同构成柔性治理与柔性监控：它既不依赖显性强制，也无需全景式监视，却在日常中维系统治，使“被规训”成为常态，让“反抗”退化为自我约束。小说以孕体为焦点，把身体政治与权力结构相互嵌合，提示当代社会中的冷漠与制度化安排同样可能成为治理的延伸。詹姆斯¹既承续了女性主义反乌托邦传统，又开辟了对“柔性治理”的文化反思路径，在阿特伍德的高压技术统治与皮尔西的技术解放之间，补充了“非技术亦可维系秩序”的批判维度。由此，小说不仅成为延续危机叙事的重要节点，也为理解现代社会中无形权力的运作提供了文学参照与批判性想象。

三、结论

《人类之子》并未依赖高科技的压迫场景，而是通过“技术

参考文献

- [1] 詹姆斯, P · D.. 《人类之子》(The Children of Men). 伦敦: 费伯与费伯出版社 (Faber and Faber), 1992 年.
- [2] 阿特伍德, 玛格丽特. 《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多伦多: 麦克利兰德与斯图尔特出版社 (McClelland & Stewart), 1985 年.
- [3] 皮尔西, 玛奇. 《时间边缘的女人》(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 纽约: 阿尔弗雷德·A · 克诺夫出版社 (Alfred A. Knopf), 1976 年.
- [4] 巴科里尼, 拉法埃拉, 莫伊兰, 汤姆. 《黑暗地平线: 科幻与反乌托邦想象》(Dark Horizons: Science Fiction and the Dystopian Imagination). 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 (Routledge), 2003 年.
- [5] 佩切斯基, 罗莎琳德. “胎儿影像: 再生产政治中的视觉文化权力” (Fetal Images: The Power of Visual Culture in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 第 13 卷第 2 期, 1987 年, 第 263 页.
- [6] 科瑞娅, 吉娜. 《母体机器: 新的再生产技术如何侵犯女性》(The Mother Machine: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from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to Artificial Wombs). 纽约: Harper & Row, 1988 年.
- [7] 法雅斯通, 舒拉米斯. 《性的辩证法: 女性解放的案例》(The Dialectic of Sex: The Case for Feminist Revolution). 纽约: William Morrow, 1970 年.
- [8] 福柯, 米歇尔. 《性史 (第一卷): 认知意志》(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An Introduction). 纽约: 潘塞恩图书公司 (Pantheon Books), 1990 年, 第 138 页.
- [9] 汉森, 克莱尔. 《怀孕的文化史: 1750 - 2000 年的怀孕、医学与文化》(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 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1750 - 2000). 汉普郡: 帕尔格雷夫 · 麦克米伦出版社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年.
- [10] 阿甘本, 吉奥乔. 《神圣人: 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年, 第 83、11 页.